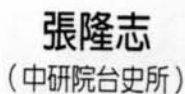


——讀《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



(中研院台史所)

一、前言：中央研究院與台灣平埔研究

中央研究院有組織的從事台灣史研究，可以溯自1986年夏季由張光直先生所推動的「台灣史田野研究計畫」。^①1988年中研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第一部出版品《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正式刊行，張先生在序文中曾經說到：「一個台灣史研究計畫以平埔族為題打第一炮是偶然的事件，而不是計畫性的產品；但這件偶然事件卻有很大的象徵意義，使人特別感覺高興和興奮。」^②

隨著1992年十月由中研院同仁結合大學與民間研究者共同成立「平埔研究工作會」，此一「有象徵意義的偶然事件」乃成為不同背景與學科學者長期討論的焦點。

^③另一方面，1993年中研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更以《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輯：竹塹社》為題出版了第一部史料叢刊，為台灣原住民史料的蒐集整理，提供了一個地域與族群個案研究的範例。^④而1994年由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所與平埔研究工作會合作主辦的「平埔研究學術研討會」，則可以視為九〇年代以來學界重新肯定平埔研究學術意義的有力註腳。^⑤

在上述背景下，1998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杜正勝先生《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的編撰，^⑥與其對於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的考訂，^⑦乃至其近年來對於台灣史上弱勢族群際遇的系列評論，^⑧除了為中研院與台灣本土人文學術研究增添另一新頁外，對於熟悉杜先生中國史造詣與關心台灣平埔研究的學者們而言，則是項意外卻又令人欣慰的驚喜。

作為一篇研究討論，本文的主要論點可分成兩部份：首先是介紹《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尤其是導論〈番社采風圖題解〉一文的内容要旨，^⑨並指出其對於台灣史研究的三項學術貢獻，亦即清代圖像史料的開發、平埔傳統文化的復原與台灣早期歷

① 張光直，〈發刊詞〉，《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期（1986年12月），頁1。

② 張光直，〈序〉，收入莊英章主編，《台灣平埔族研究書目彙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8），頁i。

③ 李壬癸，〈突破平埔族研究的瓶頸——記「平埔研究工作會」的成立〉，收入氏著《台灣平埔族的歷史與互動》（台北：常民文化出版社，1997），頁182-187。

④ 張炎憲、王世慶、李季樺主編，《台灣平埔族文獻資料選輯：竹塹社》（上）（下）（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1993）。

⑤ 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5）。

⑥ 杜正勝，《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

⑦ 杜正勝，〈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等主辦，「平埔族群與台灣歷史文化」學術研討會論文，1998年5月。

⑧ 杜正勝，《臺灣心 臺灣魂》（高雄：河畔出版社，1998），頁203-236。

⑨ 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收入《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1-42。

史的解析。其次則是就本書在圖像文獻考證、民族誌描述與宏觀歷史分析等方法特質，嘗試從歷史民族誌、雙元歷史與多重敘事等分析觀點，討論其所涉及的平埔歷史重建與多族群文化理解等相關課題，希望能作為學者對於此一台灣史新領域的研究參考。^⑩

二、《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內容特色與貢獻提要

《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是由杜正勝先生編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列為該所「珍藏史料暨典籍系列」之一。全書共分上下兩篇：上篇為導論〈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下篇為《番社采風圖》圖版與中英文說明，共收錄史語所藏台灣番社地圖（北半部）與「捕魚」到「社師」等十七幅番俗圖，合計十八幅圖帖。

杜先生在序文中首先將本圖由「台番圖說」正名為「番社采風圖」，認為應是清乾隆年間(1744-1747)巡台御史六十七命工繪製之台灣原住民風俗圖。他並說明史語所藏帖的史料價值，認為「此帖雖然不敢謂為足本，然因畫境寫實，深具史料價值，頗可推考台灣歷史初期(約西元1600-1750)平埔族之社會面貌與文化特徵，有助於台灣歷史，尤其是平埔族史之研究甚大。」而全書之撰述要旨在於「以台灣歷史初期之社會與文化為中心，結合文獻史料，對風俗圖的內容進行初步之探索，以建構平埔族從原始社會進入國家之歷史。」^⑪

本書的主要特色，除了史語所珍藏圖像史料的刊布流傳外，更在於杜先生所撰導論〈番社采風圖題解〉一文中的學術創見。〈題解〉全篇共分成六章：第一、二章是對於各帖風俗圖年代畫者，以及巡台御史六十七宦旅生涯的考訂；第三至五章是全文的重點所在，分別從體質和狀貌、髮型和服飾、以及社群生活等面向，討論《番社采風圖》所反映的平埔社會與文化；第六章則是從經濟、政治與文化等角度，分析外力入侵所造成的平埔社會變遷。

〈番社采風圖題解〉是近年來利用歷史文獻重構台灣平埔社會文化史的少見力作，杜先生在文中透過深厚綿密的文獻考證作業，釐清風俗圖版本與作者背景經歷，尤其是其結合圖像與詩文史料復原平埔傳統物質生活風貌的討論，實令人耳目一新。更重要的是，就台灣平埔研究而言，杜先生無論在材料運用、課題選擇與史觀解析

⑩ 唐素娟，〈族群歷史研究的「常」與「變」——以平埔研究為中心〉，《新史學》6卷4期（1995），頁127-161；潘英海，〈「平埔學」芻議〉，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探索台灣田野的新面向」學術研討會論文，1998年5月。

⑪ 杜正勝，〈序〉，《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同註⑩。

上，均有其獨立的見解。以下試從清代風俗圖像史料的開發、平埔傳統社會文化的復原、與台灣早期歷史發展的解析等三方面，介紹其主要特色與貢獻。

(一) 清代風俗圖像史料的開發：〈番社采風圖題解〉一文的首要貢獻，是其對於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的考訂。杜先生在文中首先分析六十七《番社采風圖》的三種版本，將中研院史語所收藏的「台番圖說」正名為「番社采風圖」外，更進而分類比較十帖風俗圖，判定其年代、作者與相互關聯，說明《番社采風圖》的史料價值。他並透過詩文及方志史料，介紹巡台御史六十七在台宦旅經歷，以及其編製兩種《采風圖》與撰述《番社采風圖考》的背景。雖然在1930年代日本台灣總督府圖書館館長山中樵，曾在此課題上有一系列開創性研究。然而本文不但在考證的深度與廣度上超越前人作品，更提供了一個清代台灣原住民圖像史的具體研究範例。^①

(二) 平埔傳統社會文化的復原：〈番社采風圖題解〉一文的論述重點，除了考訂平埔風俗圖像的版本與史料價值外，更在於解明圖像資料所傳達的歷史文化意義。作



除了《番社采風圖》外，還有其他多種以台灣原住民為對象的風俗圖，上面這兩幅收在《諸羅縣志》的番俗圖「舂米」（左）和「登場」（右）都是木刻版畫。

① 杜正勝，〈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同註①。

為首篇充分利用清代圖像與詩文史料，復原平埔傳統生活風貌的作品，杜先生旁徵博引相關台灣史中外文獻，分別從體質和狀貌、髮型和服飾、以及社群生活等三個面向，列舉討論了十四項《番社采風圖》所反映的傳統平埔社會文化特徵（參見表一）。¹¹ 相對於傳統文字史料與當代田野調查等研究取向，〈題解〉此一具有民族誌

表一、《番社采風圖》平埔社會文化表

項目	特徵	說明
一、體質和狀貌	(一) 身長高矮	有些平埔人比西歐人高大，另些較中國南方漢人矮小。無法分辨圖中真實高矮。
	(二) 拔除髭鬚	圖中平埔成人男子不長髭鬚，有鬚者皆是漢人。老人無法分辨男女。
	(三) 文身	大多數平埔一般不黥面。圖中多裸人卻無一文身，文身並非普遍景象。
	(四) 大耳	貫耳為平埔普遍習尚，貫耳者皆是男性。部份中部番社男子婚後摘除耳貫。
二、髮型和服飾	(一) 髮型	平埔髮式分斷髮、單髻、雙髻三種。圖中僅有男童與內山生番作頭陀狀髮型。
	(二) 頭飾	圖中平埔婦女頭簪花草、帶頭箍、插雉尾或雞羽、蒙頭巾。男子髮髻繫紅帶。
	(三) 裸體	裸人為平埔族代名詞，與漢人相對。圖中男子多裸露上身，婦女則絕未之見。
	(四) 衣服	平埔衣服為二幅縫合。短衣似比長衫普遍。鹿皮衣、樹皮布與圖布桶裙為傳統文化。女性必束腓裹腿。穿褲鞋為漢化指標。
	(五) 配飾	頸項與臂腕之裝飾為區分平埔與漢人的文化標識，質材以貝螺銅鐵為主。
三、社群生活	(一) 聚落	早期原住民聚落約有三百餘社，大多為平埔族，一般村社規模不大。聚落景象氣氛大致恬靜平和，翠綠修竹為平埔村落標識。
	(二) 屋宇	平埔房屋地板皆高出地面，分土台與干欄兩種形式。狀如庖形。茅蓋竹牆是南北家屋通相。家屋裝飾特重門面。屋旁有禾間。
	(三) 年齡層級	平埔社會沒有階級，無曆法，不記年歲。但劃分年齡層級，以維持社會秩序與運作。
	(四) 老少	箍肚為已未婚男性區隔標識。麻達束腰以捷走與得婦。平埔族為敬老尚齒的社會。
	(五) 女性為主	平埔族基本上屬於母系社會。婚姻以男出贅女納婿為主。婦女為家庭重心，主要勞動者，並較男子積極主動吸收知識。

資料來源：杜正勝，〈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1998），頁15-27。

¹¹ 參見本期詹素娟，〈文化符碼與歷史圖像——再看《番社采風圖》〉一文的討論。

意涵的圖像史研究，無疑為台灣史及平埔研究開啓了另一個嶄新園地與討論空間。

(三)台灣早期歷史發展的解析：〈番社采風圖題解〉一文使用的文獻資料，始自1603年陳第的《東番記》，下限約至《采風圖》的1745年為斷。全文雖以圖冊解說箋證為主，但杜先生仍以平埔社會的變化為焦點，對於十七至十八世紀中葉的台灣歷史發展提出其獨特見地。他認為「西元1600-1750年，平埔族從史前末期進入國家階段，以狹義歷史學來定義，是謂歷史初期，也可以說是台灣的古代史。不過從原始社會進入國家不是台灣社會自然演變的結果，而是外力促成的。」「外力把平埔族拉出原始社會，推入國家，平埔族遂在外人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中逐漸『文明化』，終於完全消失。」（原文頁2）雖然由於體例與篇幅限制，杜先生僅能初步勾勒此一歷史巨變的軌跡。但其在「外力入侵論」下所進行的因果解析，如米糖經濟與平埔傳統生業的改變，土官制度與平埔原始民主制的崩解，漢人社商通事與中國官僚對於平埔社會的侵凌壓迫，荷清統治者對於平埔文化的改造同化，以及平埔族群在政經文化與人口技術上的弱勢宿命等論點，尤其是其所提出的「原始社會到國家」與「文明化歷程」等兩項宏觀分析概念，相信將可刺激學者對於台灣歷史分期與社會轉型等基本解釋性課題的重新思考與論辯。

三、圖像史學、民族誌描述與歷史敘事分析： 問題與討論

在提要介紹《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一書的內容特色與學術貢獻後，筆者擬就本書在方法論上的三項特質，也就是圖像文獻考證、民族誌描述與宏觀歷史敘事等取向，討論其在平埔歷史重建與多族群文化理解上所涉及的相關課題。

（一）圖像資料與歷史真實：杜正勝先生在〈題解〉一文中對於平埔傳統文化與歷史變遷的論證基礎，是其對於史語所珍藏六十七《番社采風圖》版本與內容的考訂。對於如何利用圖像資料重建歷史真實，杜先生在〈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一文中對其研究方法做了詳盡的說明。^①

他首先以九種十五帖平埔圖像資料的年代考訂為例，強調「任何資料未經斷代是不具歷史意義的。」（原文頁3）。在結合圖像史料與文獻研究上，他指出清人除了圖繪外，也以詩文描寫平埔生活風俗。而「詩文或圖繪的子目即是平埔族群的文化特徵，也可以說是漢人對於平埔族群認識的總結，在風俗畫便是構成『格套』，我們依

① 杜正勝，前引文，同註②。

循子目及詩文圖畫內容，可以建構平埔族群之社會與文化的面貌。」(頁16)。杜先生更進而提出「文化成分」的概念作為風俗圖寫實性依據，他說「根據髮型、髭鬚、大耳、裸體、衣服、配飾，以及屋宇、牛車、甚至用葫蘆、筍簍等器具，可以判斷風俗圖的真實程度。」(頁18)。對於圖像格套化後的文飾問題，他則以「母題構圖分析法」來推斷不同圖版間的模仿傳承關聯(頁28)。

透過上述對於圖像史料價值的綿密考訂作業，杜先生對於風俗圖與歷史研究做出如下的評語：「風俗圖不比純美術之創作，應以寫實為貴，風俗圖畫工一般也不會刻意馳騁想像，因此風俗圖容易抄襲，終於形成『格套』。然而真實的格套也可以作為生活萬象的縮影，具有典範意義，對庶民歷史的研究而言，也不失為一種代表性的象徵。」而經由這九種十五帖平埔族群圖像資料的比較研究，「除檢擇信實可用之資料以建構歷史外，史學家當深刻體認到『真實』是史學的基本追求，否則儘管彩筆生輝，終究無補於實際的歷史。」(頁44)

如同前文所述，筆者認為〈番社采風圖題解〉一文的首要貢獻，在於其提供了清代台灣原住民圖像史研究的具體範例。而杜先生〈平埔族群風俗圖像資料考〉一文中所提示的研究方法，也將可作為台灣史學者未來進一步深入清代風俗圖像史料的重要參考。然而從平埔歷史重建與文化理解的角度而言，六十七的《番社采風圖》雖然較其他風俗圖具有較高的可信度及完整性，但其是否能作為復原平埔傳統社會文化內涵與意義的基本依據則值得深思。

雖然杜先生在〈題解〉一文中，嘗試以《番社采風圖》的內容考訂為根據來復原平埔傳統文化，並對於相關圖像及詩文的客觀性與史料價值有極敏銳的洞察與檢證。但由於《番社采風圖》作為清人「格套」風俗畫的特質，筆者認為采風圖繪乃至詩文史料所傳達的首要歷史意義，並不在於其忠實反映原住民的社



岸裡社第三代土官潘敦仔（乾隆12年）



潘敦仔行樂圖（乾隆12年）

會文化原貌，而毋寧是其中所流露中國官僚文人對於「異族」的認知方式與分類內涵。就此意義而言，《采風圖》中的題詞與描繪，既非民間漢人的常民知識，更與平埔族群的土著觀點無涉。換言之，我們在閱讀《番社采風圖》時，除了注意杜先生所觀察到的平埔「文化成分」外，更值得思考的是隱含在各幅彩繪與題詞背後，滿清官僚六十七與其畫工對於台灣這個「人類學博物館」的文化展演與再現方式。進而言之，就台灣史研究的角度而言，筆者認為《番社采風圖》雖然可以作為理解早期原住民生活風貌的輔助參考，但其反映的重要「歷史真實」與作為直接史料的主要價值，應在於對清代官僚文人「台灣觀」乃至「殖民論述」內涵與特徵的研究，而非平埔社會文化傳統的重建。¹⁵

（二）《番社采風圖》與平埔民族誌描述：杜先生以六十七《番社采風圖》為基礎來重構平埔社會文化所面臨的學術挑戰，除了圖像史料本身作為歷史反映與文本再現的知識論課題外，更重要的則是《采風圖》在平埔民族誌描述上的根本缺陷，以及長期以來台灣學界在平埔研究假設上的可能限制。

關於六十七《番社采風圖》的民族誌意義與史料價值，杜先生在〈題解〉一文中除了肯定其寫實性外，更具體說明其順序安排的合理性：「（史語所本）首地圖，其次為捕魚、捕鹿、採採，屬於採集生業；第三部份種芋、耕種、刈禾、舂米之農作；第四部份糖廬，屬於經濟作物和生產；這樣的次序比較能體現平埔族經濟發展史的實況，尤其種芋先於種稻，對平埔族的歷史的確有相當深入的認識。



平埔族的採採圖

接著是織布、乘屋、渡溪、遊車和迎婦等生活禮俗，然後一幅描寫內山『生番』的布床，以及平埔族對『生番』之防範的守隘與瞭望，最後一幅社師，記錄平埔族的漢化。」雖然不能確定此一版本裝裱次序始於何時，或是出於捐贈者意人民族學家羅斯(Ros)的安排，杜先生仍認為此一次序「最能反映平埔族的歷史面貌。」（頁11）並進而藉以重構其中所反映的平埔體貌服飾與社群生活特徵。

如前文所述，〈題解〉一文據以甄別風俗圖寫實性與平埔傳統社會的核心概念，是杜先生所謂的平埔「文化成分」。然而從本文表一所列舉的十四項平埔文化特徵

¹⁵ Emma Teng (鄧津華), "Travel Writing and Colonial Collecting: Chinese Travel Accounts of Taiwan from the Seventeenth through Nineteenth Centuries,"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97.

中，我們可以發現《番社采風圖》雖然可以呈現平埔物質生活與部份生命禮俗的具體樣態，但卻無法充分傳達較抽象的平埔社會結構與親屬組織，亦無法觸及更深層的平埔宗教祭儀與神話信仰，更遑論對於土著語彙及族群意識等重要面向的描述與理解。《采風圖》在原住民社會文化描述上的這些基本缺陷，使得其作為平埔歷史民族誌的功能，遠遜於諸如黃叔瓚〈番俗六考〉等重要清代文獻，乃至十九世紀中葉以來具有近代人類學意涵的中日西文調查記錄。^①基於上述原因，筆者認為史語所版《番社采風圖》雖在寫實性與次序安排上，較其他風俗圖更為可信而合理，但仍不足以作為理解平埔社會文化的核心史料依據。

除了以《采風圖》作為平埔民族誌描述的基本架構外，我們亦可看到〈題解〉一文在分析平埔文化時的若干基本立場與論述特質。例如作者雖然極為重視時期、族群與地域的可能差異，但基本上仍採取「異中求同」的社會同質論立場，而將平埔族群間的差異視為歷史變遷的結果或例外。杜先生雖自始便指出所謂「平埔族」並不是族群的名稱，並提到自黃叔瓚〈番俗六考〉以來對於平埔族群的分類史，但仍強調「本文重點在於考察台灣歷史發展的大勢，不斤斤計較各族文化的異同，故仍因襲比較寬鬆的族稱——這個頗為含混的『平埔族』」（頁2）。

筆者認為〈題解〉此一研究假設與論述立場，在解讀及分析《采風圖》時，雖然有助於觀察平埔社會的若干共相與通則，或發掘杜先生所謂的「平埔文化成分」，但卻容易忽略平埔族群與地域間的差異，並非歷史變遷或例外的結果，而可能是不同社會類型與多元文化特質的表現。另一方面，細心的讀者應可注意到，由於歷史際遇與文獻記錄等背景因素，〈題解〉所重構的所謂「台灣歷史初期」的平埔社會文化原貌，實以荷鄭與前清時期便活躍於歷史舞台的南部西拉雅等族群為主，而非較「後進」的中北部平埔如巴宰乃至噶瑪蘭等族群的歷史社會實態。進而言之，長期以來台灣學界對於平埔社會文化的傳統成說，例如以母系社會為平埔族群常態與通例等看法，實肇因於以西拉雅等南部母系族群為平埔社會範型的刻板印象，而非比較研究的結果。^②

總之，正如同「高山族」一詞無法細膩地解明台灣原住民九族在經濟、政治、親屬與宗教等面向的複雜形貌與歷史動態，^③筆者認為在利用《采風圖》進行平埔民族

① 黃叔瓚，《台海使槎錄》，台灣文獻叢刊第4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7）；伊能嘉矩，《觀風蹉跎》手稿（1897），台灣大學「伊能文庫」微捲編號T0021；William Campbell（甘為霖），*Formosa Under the Dutch: Described from Contemporary Records*, (London: Kegan Paul, Trench, Trubner & Co., 1903), pp. 9-25；衛惠林，《埔里巴宰七社志》（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81）。

② 張隆志，〈從《岸裡文書》看清代台灣平埔族群的社會生活——對於「平埔母系社會論」的再思考〉，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契約文書與社會生活」研討會論文，1999年3月。

③ 黃應貴，〈台灣土著族的兩種社會類型及其意義〉，收入黃應貴主編，《台灣土著社會文化研究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6），頁3-43。

誌描述時，唯有嘗試從多族群社會的觀點，而非以「平埔族」等通稱來解讀中的原住民傳統文化特徵，才能解明個別平埔族群與地域間的異同關聯，從而進行整體性的比較與定性分析（參見表二）。就此課題而言，正視平埔族群在社會類型上的多元可能性，以及結合歷史民族誌與文獻研究的分析取向，應是學者未來進行平埔社會文化重建與理解的重要途徑之一。

（三）「外力入侵」、「弱勢族群」與平埔歷史敘事：作為一篇體大思精的圖像歷史箋證，〈題解〉除了前述內容特色與貢獻外，在歷史敘事上亦有其值得注意之處。舉例言之，相較於其在進行圖像考證時的冷靜客觀，杜先生在民族誌描述時，則流露了其對於平埔文化的抒情想像，如在論及平埔聚落時，杜先生除了緬懷農業台灣時代的寧謐村居景觀外，更以金字塔與月神廟等古文明政教建築相對照，說明「一個幾乎

表二、《番社采風圖》社名對照表

編號	圖名	社名	地域	族群	備註
1	捕魚	目加溜灣、哆咯囑	諸羅縣	西拉雅、洪雅	
2	捕鹿	大甲、後壠、中港、竹塹、霄裏	淡水廳	道卡斯	
3	獠採	麻豆、霄壠、目加溜灣	諸羅縣	西拉雅	
4	種芋	內山生番	鳳山縣		「高山族」
5	耕種	卓猴、羅漢門、新港	台灣縣	西拉雅	
6	刈禾	各社	彰化縣、淡水廳	中北部平埔各族群	
7	舂米	各社	彰化縣、各縣	平埔各族群	
8	糖廍		各縣		漢人
9	織布	岸裏、大甲東、大甲西	淡水廳、彰化縣	巴宰	
10	乘屋	新港	台灣縣、諸羅縣	西拉雅	
11	渡溪	目加溜、麻豆	諸羅縣	西拉雅	
12	遊車	各社	台灣府		
13	迎婦	東螺、西螺、大武郡、半線	彰化縣	巴布薩	
14	布床	傀儡山生番	鳳山縣		「高山族」
15	守隘	各社	各縣	平埔各族群	
16	瞭望	竹塹、南崁、芝包裹、八里分	淡水廳	道卡斯、凱達格蘭	
17	社師	下淡水、赤山、加藤	鳳山縣，各縣	西拉雅、平埔各族群	

資料來源：六十七，《番社采風圖考》，台灣文獻叢刊第90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1）；張耀錫編，《平埔族社名對照表》，《文獻專刊》第二卷1、2期另冊（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51）。

絕對平等的社會勢必如農村一般的寧靜。」(頁23)。而在文末論及平埔族群在外力入侵的壓力下，由「原始社會到國家」與「文明化」的宏觀歷史變遷時，杜先生更在字裡行間難掩其對於外來統治者的道德批判與平埔歷史宿命的喟嘆，並在結語中以平埔族群的悲劇命運軌跡，作為處理弱勢族群文化的歷史借鑑(頁37)。

對於《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圖版說明與〈題解〉一文中的相關台灣史實，尤其是〈題解〉第六部份所涉及的史觀解釋問題，由於筆者能力與時間的限制，無法在本文進行詳細的討論。以下僅就知見所及，從史實陳述、文化概念與敘事類型等三方面，舉例說明相關研究成果及個人初步淺見，希望能作為學者進一步研究與對話的參考。

在史實陳述方面，近年來清代台灣史相關研究成果，如施添福對於土牛紅線，^①尹章義對於通事角色，^②翁佳音對於早期中部平埔政治組織，^③張士陽對於雍正年間中部平埔番變等課題的研究，^④以及邵式柏(John R. Shepherd)對於鹿皮貿易與平埔生計變遷的分析，^⑤均可以作為檢證本書在個別圖版說明(如第十五圖「守隘」)，以及早期平埔史事分析(如社商通事對於平埔社會的侵凌，土官制度與平埔原始民主制的崩解，平埔同化過程無大規模族群屠殺與鎮壓，米糖經濟與平埔傳統生業的改變等論點)的參考。而邵式柏、陳秋坤、施添福與柯志明等人的新近論著中，對於清代國家理性、熟番地權制度與族群政策性質等重要解釋性課題的不同見解與論辯，^⑥則有助於釐清平埔族群歷史發展中，結構變遷動力與傳統文化特質間的作用關聯，並與〈題解〉以「外力入侵」與「弱勢族群」為解釋主軸的說法相互參照。

在文化概念方面，如同前文所述，杜先生除了在〈題解〉中對於台灣歷史分期與社會轉型等課題，提出了「原始社會到國家」與「台灣沒有經歷所謂中古時期」等饒富興味的假說外，最值得注意的則是其以「文明化」概念來描述平埔族群的文化變遷歷程。關於「文明化」一詞，杜先生有如下的說明：「在最近一個世紀，平埔族有些

① 施添福，〈台灣歷史地理研究割記(一)：試釋土牛紅線〉，《台灣風物》39卷2期(1989年6月)，頁95-98。

② 尹章義，〈台灣北部拓墾初期「通事」所扮演的角色與功能〉，收入氏著《台灣開發史研究》(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頁173-278。

③ 翁佳音，〈被遺忘的台灣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台灣風物》42卷4期(1992年12月)，頁144-188。

④ 張士陽，〈雍正九、十年間台灣中部先住民の反亂〉，《台灣近現代史研究》6(1988)，頁5-55。

⑤ John R. Shepherd, *Statecraft and Political Economy on the Taiwan Frontier, 1600-1800*(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35-38, 364-370。

⑥ 陳秋坤，〈清代台灣土著地權：官僚、漢佃與岸裡社人的土地變遷，1700-1985〉(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施添福，〈清代台灣岸裡地域的族群轉換〉，收入潘英海、詹素娟主編，《平埔研究論文集》，同註②，頁301-332；柯志明，〈番頭家：十八世紀台灣的族群政治與熟番地權制度的演變〉(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出版中)。

文化可能殘存在台灣『漢人』社會中，但作為族群，平埔族基本上已經消失。平埔族的消失其實即是他們『文明化』的結果。首先雖然有過短暫的荷蘭化，主要則是隨之而來的徹底漢化。」在荷蘭、明鄭與滿清先後入主台灣的過程中，平埔族群原有社會文化不斷遭到吞蝕，「他們就是在經濟剝削和政令壓迫中接受『文明』的洗禮，進而逐漸痛苦的融入『文明』的世界。」他更進而指出「所謂『文明化』是多方面的，從衣冠、裝飾到語言、社會組織以及宗教信仰，全面地變化。」（頁34）

雖然杜先生指出「平埔族文明化這個複雜的課題牽涉甚廣，這裡只從文書窺其大略。」但從其對於荷清統治者文教政策的討論，與文中不時出現的「漢化」與「消失」等形容，我們似可看出他是以其所復原的平埔傳統「文化成分」作為族群辨識與文化消長的主要依據。對於〈題解〉此一強調族群外部特徵的客觀論立場，以及其所謂「文明化」概念中的同（漢）化論色彩，最近人類學者如黃應貴、葉春榮與潘英海間，對於平埔研究中「同化」、「涵化」與「合成文化」等文化概念的反思論辯，^⑤ 歷史學者如王明珂對於族群邊界與認同記憶的研究實例，^⑥ 以及歷史人類學者如邵式柏等人對於十九世紀平埔人改信基督教現象的觀察分析，^⑦ 相信均有助於重新理解所謂「平埔漢化消失」說法的具體內涵與複雜意義。

最後，在敘事類型方面，《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基本上是以圖像箋證解說為主的歷史作品，然而作為導論長篇，〈番社采風圖題解〉一文則包含了圖像史料考訂、民族誌描述與宏觀歷史解析等三種風格迥異的論述類型。在介紹了本書的研究特色與相關論點後，筆者想就平埔歷史敘事此一長期以來被學者忽略的課題，提出雙元歷史與多重敘事的研究觀點，作為本節討論的結語。

從平埔社會文化理解的角度而言，〈題解〉第六部份以「外力入侵」為題所呈現的「弱勢族群」歷史圖像，雖然在文獻徵引與分析語彙上極富洞見，但在其作為平埔歷史敘事則可能有其限制。舉例言之，在論及平埔文化變遷時，杜先生說到：「本文不能全面論述平埔族的文明化或漢化，惟其趨勢，大概是從南而北、從城到鄉逐漸展開的。平埔族傳統文化之失落，就文化本身而言，他們是弱勢；就政治上而言，他們是被統治者；而在人口方面，他們也成為少數。」（頁35）雖然杜先生對於傳統（原始）平埔文化有相當的認識與同情，但〈題解〉此種整體論式的歷史敘事，尤其是其

^⑤ 黃應貴，〈導論：從周邊看漢人的社會與文化〉，收入黃應貴、葉春榮編，《王崧興先生紀念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7），頁15-27；葉春榮，〈人類學的平埔研究〉，中研院民族所主辦，「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學術研討會論文，1997年3月；潘英海，前引文，同註①。

^⑥ 王明珂，《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文化認同》（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7）。

^⑦ John R. Shepherd, "Plains Aborigines and Missionaries in Ch'ing Taiwan, 1859-1895,"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主辦，「台灣土著宗教祭儀」研討會論文，1988年5月。

所隱含的優勝劣敗生存邏輯，在資料性質限制與缺乏比較研究的平埔研究現況下，卻可能使得台灣平埔族群史所具有的「原住民史」與「殖民遭遇史」雙元歷史特質，以及其作為「多族群社會」，在族群、地域、階層、性別與時期上的重要差異與多重樣態，均淹沒在「外力入侵」與「弱勢族群」的歷史圖像之中而闕然不彰。

從研究史的角度而言，自1904年伊能嘉矩的《台灣番政志》以來，學者在「理番政策史」與「漢番關係史」的研究視野下，便習以悲劇宿命來描述平埔族群的歷史發展軌跡。^⑤直到最近，此一強調「平埔漢化」的解釋傳統，與其所隱含的文化心態與學術假設，才開始受到平埔學者的質疑和挑戰。而在「多族群社會觀」取代「漢人移民開發史觀」，成為台灣史研究共識的同時，平埔族群史作為「原住民史」與「殖民遭遇史」的雙元歷史特質，以及結合文獻、民族誌與田野工作的「歷史人類學」研究取向，也逐漸成為研究者的努力目標。^⑥筆者認為，隨著學者對於「族群」與「涵化」等分析概念的反思論辯、對於民族誌與文獻史料的開發解讀、以及對於個別族群與地域歷史個案的累積比較，我們應可期待在不久的將來，能看到兼顧結構變遷動力與傳統文化特質，並呈現庶民生活多重風貌的中文平埔歷史書寫。^⑦

四、結語：作為當代台灣文化論述的平埔研究

作為一篇研究討論，本文介紹了《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的內容特色，並指出其在清代圖像史料開發、平埔傳統文化復原與台灣早期歷史解釋等三方面的可能貢獻。筆者認為，從平埔歷史重建與多族群社會文化理解的角度而言，〈番社采風圖題解〉無論在圖像史學、社會文化論與歷史敘事分析等課題上，均為平埔研究此一台灣史新領域，提供了重要的參考範例與討論空間。而本文中有關歷史民族誌、雙元歷史與多重敘事觀點的陳述，則是筆者在閱讀本書後的初步思考與未來努力方向。在以下結語中，我將就台灣平埔研究的當代意義做一評論，嘗試回應《古今論衡》〈代發刊詞〉中對於學術與世變關懷的呼籲。^⑧

自十七世紀以來，便在島嶼歷史與殖民遭遇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台灣平埔族群，其歷史經驗與文化記憶，既迥異於先後來台的閩粵漢人移民，亦與長期被番界政策隔離的今日土著九族有所不同。但源自清代「生/熟番」與日治初期「平埔/高山族」等

⑤ 伊能嘉矩，《台灣蕃政志》（台北：台灣總督府民政部殖產局，1904）。

⑥ 張隆志，〈追尋失落的福爾摩沙部落——台灣平埔族群史研究的反思〉，收入黃富三等主編，《台灣史研究一百年：回顧與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籌備處，1997），頁257-272。

⑦ 參見邵式柏(John Shepherd)前引書，同註⑤；鈴木滿男，〈「漢蕃」合成家族的形成と展開：近代初期における台灣邊疆の政治人類學的研究〉，東京大學社會學博士論文，1988年。

⑧ 杜正勝，〈代發刊詞〉，《古今論衡》第1期（1998年10月），頁2-3。

政治與學術分類史所造成的混淆，使得直到最近，「平埔族」一詞無論在學術討論與日常交談中，仍常是個曖昧而混淆的語彙。而更由於其概念上的模糊與實證上的困難，台灣平埔族群史長期以來均被主流歷史學與人類學者視為邊陲領域。^⑬

然而自八〇年代中期起，原來為少數學院與民間學者默默紮根推動的台灣平埔研究，隨著政治解嚴以來台灣史由禁忌中解放成長的趨勢，遂由主流典範下的「學術雞肋」，發展至今儼然蔚為本土研究中的「學術新寵」。九〇年代以來由於原住民復振運動的影響，原本被視為「漢化」與「消失」的平埔後裔，更在長老教會與部落菁英的合作下，開始重建其文化傳統與歷史記憶。就此而言，倘若1992年十月由人類學者潘英海等人所發起的中研院「平埔研究工作會」，象徵著台灣學界對於平埔研究意義的肯定，那麼1998年九月由文史工作者劉還月等人所成立的「台灣平埔學會」，則代表了民間學者與平埔後裔對於族群文化復原保存的期待。^⑭

在族群關係、國族認同與集體記憶成為重要公共課題的今日台灣，^⑮ 平埔研究者所面臨的論述情境，實遠較前人更為複雜，而其在提供專業言論與開拓文化視野上的學術責任亦因而更加深刻。不同於以往將之視為靜態範疇的做法，筆者認為「平埔」一詞不僅代表某種身分類屬（如「熟番」或「原住民」），或某些文化特質（如西拉雅的「祀壺」或巴宰的「挨央」），更意味著對於族群疆界的探索與洞察。而吾人對於台灣平埔族群史的重新發掘與理解，不但有助於當代社會有關族群定義與認同的論辯，更應是從多元觀點重建島嶼歷史與本土文化論述的重要起點。就此意義而言，業師曹永和先生對於「台灣島史」概念的提示，^⑯ 與杜正勝先生對於《番社采風圖》的爬梳，雖然蹊徑不同，但都為「本土院士與台灣史研究」做出了生動而影響深遠的示範！

⑬ 張隆志，〈族群關係與鄉村台灣——一個清代台灣平埔族群史的重建和理解〉，國立台灣大學文史叢刊87（台北：國立台灣大學，1991），頁64-81。

⑭ 〈平埔族成立學會爭取正名〉，《聯合報》，1998年9月21日，14版。

⑮ 盧建榮，〈分裂的國族認同，1975-1997〉（台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

⑯ 曹永和，〈台灣史研究的另一途徑——「台灣島史」概念〉，《台灣史田野研究通訊》第15期（1990年6月），頁7-9。